

<<绿化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绿化树>>

13位ISBN编号：9787530212479

10位ISBN编号：7530212478

出版时间：2012-8-1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贤亮

页数：182

字数：16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绿化树>>

内容概要

《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2月,它是“右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为主线,叙写了

“我”两次“劳动改造”之间在一个陌生的农场短短两三个月间的经历。

作品通过人物的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解读,展现了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同时,作者又在《绿化树》中表现了艰辛生活中的美好闪光。

这种闪光通过人物的塑造来体现,像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等。

他们以人性的温情、健康的体魄和面对艰辛时强悍的乐观,给“我”信心和温暖。

这其中,尤以马缨花着力最多,最为动人。

她漂亮、壮实、热情、爽朗,本能地拥有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能力,而且生存得很好。

她对“我”的一切疼爱、怜悯、帮助,并非出于男女情欲的性吸引,更多的是一位善良女子对一个无依无靠、穷困潦倒、遭人欺凌的落魄男子的本能同情和怜悯。

她像母亲养儿子似的用白馍、杂合饭和爱抚抚慰着“我”,使“我”成为正常的人。

小说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兼具浪漫主义诗情,真实、艺术地再现了生活。

<<绿化树>>

作者简介

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

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自北京移民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

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的作家。

1993年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其代表作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青春期》、《一亿六》等。

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多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搬上银幕。

作品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绿化树>>

章节摘录

一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

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

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

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

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

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膝盖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

牲口并不比我强壮。

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

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

你还是活过来了。

”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

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

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

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

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渗渗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郁悒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

有时，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

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

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你饿吗？

饿着哩！

饿死了没有？

嗯，那还没有。

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

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的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答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

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袷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

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

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

我仍然兴致勃勃。

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

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

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

<<绿化树>>

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

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

车路两边是稻田。

稻茬子留得很高。

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

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

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

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

遗憾！

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

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

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

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

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

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

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

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

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

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

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

糟糕！

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

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

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灵啊——” “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

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

这家伙总交好运道。

“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

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

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像你，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哩！

浪过世面，吃过香的喝过辣的！

像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

<<绿化树>>

熊！

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嫉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什么地方比我优越。

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

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

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

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

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

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

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

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

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梆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

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

我是有经验的。

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

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

“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

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

我站直腰，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大车。

二 是的，我今天情绪很好。

早晨，吃劳改农场最后一顿饭时，因为我们这些已经被释放的就业人员可以不随大队打饭了，在伙房的窗口，我碰见了在医院里结识的病友——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

他也被释放了，正在等农场给他联系去向。

“章永璘，你要走了吗？”

“尽管他还穿着劳改农场的服装，胸前照例有一大片汤汁的污点，却用最温文尔雅的姿势祝贺我，还和我像绅士般地握了握手。

这种礼节，对我来说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

可奇怪的是，这种最普通的礼节又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我原来很熟悉的世界。

于是，我也尽可能地用十足的学者风度在吵吵嚷嚷的伙房窗口与他交谈起来。

“那本书怎么办？”

“我问，‘怎么还你呢？’”

“给你寄到……” “不用！”

“他一手托着一盆稀汤，一手慷慨地摆了摆，那姿态俨如在鸡尾酒会上，‘送给你吧！’”

也许……他用超然的眼光看了看四周，‘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

“你指的是我们？”

“还是……我也谨慎地看了看打饭的人群。”

<<绿化树>>

有一个犯人嫌炊事员的勺子歪了一下，正声嘶力竭地向窗口里吵着定要重舀。

“还是我们……国家？”

“记住，”他的食指在我胸前（那里也有一大片汤汁的斑点）戳了一下，以教授式的庄重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对他的话和他的神态，我都很欣赏。”

在人身最不自由的地方，思想的翅膀却能自由地飞翔。

为了延长这种精神享受，我虽然不时地偷觑着窗口（不能去得太晚，窗口一关，炊事员就不耐烦侍候你了。

即使请动了她，他也要在勺子上克扣你一下，以示惩罚），但同时也以同样庄重的口吻说：

“不过，第一章很难懂。”

那种辩证法……用抽象的理论来阐述具体的价值形成过程……”

“他表情惊讶地提示我，仿佛我有个书库，要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似的，接着又皱起眉头，”

“一定要读黑格尔。”

他的学说和黑格尔有继承关系。

读了黑格尔，那第一章《商品》就容易读懂了。

至于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二篇《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不在话下了……”

“是的，是的。”

“我用在学院的走廊上常见的那种优雅姿态连连点头，”仅仅那篇《初版序》就吸引了我，可惜过去，我光读文学……”

他和我告别，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盆稀汤走后，我扑到窗口伸进罐头筒，炊事员正要往下撂板子。

“你他妈的干啥去了？”

！

“我帮着装行李来着。”

“我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谦卑地、讨好地笑着，”我这是最后一顿饭啦！”

“哦——”炊事员用眼角瞟了我一下，接过我的罐头筒，舀了一瓢以后又添了大半瓢。

“谢谢！”

谢谢！

“我忙不迭地点头。”

“等等。”

“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炊事员擦着湿漉漉的手走到窗口，探头看看我，”你狗日的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吧？”

“是的，是的。”

“他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给了我一种不敢想象的希望。”

“你真他妈的不易！”

“果然，他从窗口旁边的笼屉里拿起一对昨天剩下的稗子面馍馍，拍在我像鸡爪般的手上，”

“还没等我再次道谢，他们俩就”啪”地撂下了黑叽叽的窗板。他们不稀罕别人感恩戴德，这样的话他们听得太多了，听腻了。”

这才是真正的“祖宗有灵”！

罐头筒里有一瓢又一大半瓢带菜叶的稀饭，手里还有两个稗子面馍馍。

两个！

不是一个！

这两个馍馍是平时一天的定量：早上一个，晚上一个。

稀饭是什么样的稀饭啊！

<<绿化树>>

非常稠，简直可以说是黏饭！

打稠稀饭，也是我们平时钻天觅缝地找都找不到的机会。

由于加菜叶的稀饭里放了盐，这种饭会越搅和越澥。

炊事员掌握了这个规律，他可以随他的兴致和需要，要么在开饭之前拼命地搅一阵，把稠的翻上来，于是排在前面的人就沾光了——“祖宗有灵”！

要么稳稳地一瓢一瓢撇，那么稠的全沉了底，排在后面的人就鸿运高照！

后一种情况，多半出现在炊事员因为忙而自己在开饭前没有吃上饭的时候——他们要把桶底的稠饭留给自己吃。

一般情况下，炊事员们是希望我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打饭的——早开完饭他们早休息。

可是，谁也不知道炊事员在哪顿饭处于哪种情况；况且我们的人数又非常多，伙房里有十几个将近一人高的大木桶，更预测不到炊事员准备把哪一桶的稠饭留给自己吃——总而言之，打稠饭的机会比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还难以捉摸，完全要靠偶然性，靠运道。

今天我的运道就很好！

而这恰恰在我开始新的生活的第一天！

这是个好兆头！

所以我非常高兴！

三 其实，我平时也比一般犯人吃得多，只要是打稀饭，而不是稗子面馍馍，我总要比别人多一百毫升左右。

诀窍就在于我这个罐头筒。

自一九五九年春天伙房不做干饭，只熬稀粥以后，劳改农场即刻兴起了用大盆打饭的风气，瓷碗很快就淘汰了。

因为炊事员舀汤的速度相当快，如果用小口饭具，瓢底哩哩啦啦的汤汁就会滴回到桶里，这无疑是个损失。

用敞口饭具，瓢底的汤汁当然会掉到盆里，归于自己了。

脸盆太大，磕磕碰碰的不好往窗口里送，并且稀饭会沾得满脸盆都是，反而得不偿失。

那必须是比脸盆小、而又比饭碗大的儿童洗脸用具。

在困难年代，这种用具是很难买到的。

然而“营业部主任”有办法。

我怀疑他连百货公司的儿童用品也偷到家里囤积了起来，或是他的余党还没有抓尽。

反正，他让每月都来探望他一次的那个与他同样讨厌的老婆，替组里每人都代买了一个。

当然，他不会白白地效劳的。

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人虽然送来里面了，而在外面却依然如何如何“有办法”。

就像蜘蛛结好了网，等待小虫扑到上面去一样等待我向他求告。

到时，他就会摆出各式各样的面孔，说出各式各样的话来取笑我。

可是我偏偏不买他的账。

我身无分文，又没有外面寄来的食品付给他这个掮客做佣金。

我母亲在北京寄人篱下，靠给街道上编织塑料网袋，每月挣十来块钱生活，我没有面皮再向她老人家要求寄什么东西。

但我有我的办法。

我有一个从外面带来的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

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

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边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

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哩哩啦啦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

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

<<绿化树>>

每次从打饭的窗口回号子，“营业部主任”都要捧着那个印着小猫洗脸的崭新的儿童面盆，神气活现地在我面前晃一晃。

这使我很容易看清楚他的稀饭打到哪里，正在小猫的腰部。

有一次，趁全组的人都出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号子里休病假时，我把我的罐头筒盛上水，水面刚好达到我平时打的稀饭的位置，然后再倒到他的面盆里。

试验证明：我每顿饭都比他多一百毫升！

水面淹没了小猫拿着毛巾的爪子。

这一百毫升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得到的。

我的文化知识就用在这上头！

但盆子毕竟有盆子的优越性——它可以让人把饭舔得一干二净。

“营业部主任”舔起盆子来，有种很特殊的姿势。

他不是把脸埋在盆子里一下一下地舔，而是捧着盆子盖在脸上，伸出舌头，两手非常灵巧地转动着盆子。

如果发挥想象的话，那既像玻璃工人在吹制圆形的玻璃器皿，又像维吾尔族歌舞中的敲击手鼓。

不久，他这种姿势也随着他代买的盆子在组里推广开了。

罐头筒是没法舔的，这真是个遗憾！

我只能在每次吃完饭后用水把它涮得干干净净，再把涮罐头筒的水喝掉。

马口铁的罐头筒还不像搪瓷的面盆，不擦干很快就会生锈的。

所以我每顿饭后都要用毛巾仔细地把它擦干，放在干燥通风的窗台上。

这当然引起“营业部主任”的不快。

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他就此指责我“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

，“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生活作风”。

我虽然也暗自惭愧，觉得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想到多出来的一百毫升，又私下里感到宽慰。

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这样：他总认为他不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压倒了我，我也总认为不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

现在，我就认为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

早饭我比他多吃了大半瓢，而且我的一瓢零大半瓢全是稠稠的黏饭，直到此刻我还感到它们在胃里尚没有完全消化掉，还在忠诚地给我提供卡路里。

而他的一瓢不过是稀汤而已。

尽管他把黄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但他的怀里有馍馍么？

没有！

肯定他没有！

我的怀里却有两个货真价实的稗子面馍馍。

我想什么时候拿出来吃就拿出来吃。

我现在不吃只是我不想吃它罢了。

福气不得享得过头；乐极必然生悲。

这是我劳改了四年体会到的人生哲理。

“走啰！

大车走远啰！

”我向大车赶去，又回头朝萝卜田里的几个人大声吆喝。

我还有比他优越的地方。

我意识到了我今天可以离开那条土路，今天可以跨过那条沟、那条渠，今天可以到这田里来找黄萝卜（找没找到是另外的问题），今天可以想什么时候回到大车跟前就去什么时候回去；今天我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不是被队长班长派遣的，也不必事事都要向队长班长喊报告。

“营业部主任”虽然也这样行动了，并且行动得比我还要早、还要快，但不自觉地运用这种自由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这二者在精神上就处在不同的层次。

我觉得我比他高尚，比他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享受，虽然没有找到黄萝卜，我还是心满意足地、带

<<绿化树>>

着一种精神胜利的自豪感追上了大车。

“走啰！”

大少爷在发号施令啰！

“我听见”营业部主任“在后面向其他人这样喊。

不一会儿，他们也跟了上来。

四 大车照旧不紧不慢地走着。

那匹枣红马的嘴唇不流血了，伤口凝着一道乌黑的血斑。

任何伤口都会愈合的。

它明天仍旧会像往常一样被拉来套车。

它就这样拉车，流血，拉车，流血……直到它死。

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脸上带着一股沉思的神情。

他一点也不搭理我们，好像他身边压根儿就没有我们这几个人似的。

他的沉默，倒使我有些不安。

他是这个农场派到劳改农场来接我们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摸不清他是干部还是工人。

他套车、赶车、捆绑行李的动作干净利索；他的话很少，操着河州口音，说出的话语句也很短，至多两三个词，老像是有满腹心思。

他没有对我们几个人下过命令，但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好感。

他的表情是冷漠的、严厉的，在扬鞭的时候咬着牙，显得很残忍。

他大约在四十岁左右，但也许实际年龄没有那么大，西北人的脸面看起来都显老。

他身躯高大，骨骼粗壮；在褐色的宽阔的脸膛上，眼睛、鼻子、嘴唇的线条都很硬，宛如钢笔勾勒出来的一张肖像：英俊，却并不柔和。

我一面悄悄地打量他，一面在心里分析自己不安的原因。

最后我发觉，原来我是被人管惯了，呵斥惯了。

虽然我意识到我今天获得了自由，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在潜意识下，没有管教和呵斥，对我来说倒不习惯了；我必须跟在一个管我的、领我的人后面。

我微微地感到屈辱，于是怀着一丝反抗情绪离开了他几步，靠到路边上去走。

牲口颠蹶着，大车摇晃着，马蹄和车轮踏碾着寂寥的土路。

我们几个就业人员跟在后面，默默无语。

这时，田野上刮起了微风。

山脚下，一股龙卷风高扬起黄色的沙尘，挺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根顶天立地的玉柱。

不知什么时候，空中飞来了两只山鹰。

它们并不扇动翅膀，仅靠着气流的浮力，在我们头顶“嘹嘹”地盘旋。

兀地，像是应和饥饿的山鹰“嘹嘹”的啼鸣一般，这个如石雕似的车把式，喉咙里突然发出一声悠长而高亢的歌声： 哎———— 接下来，他用极其忧伤的音调唱出了：

打马的鞭儿闪断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走马的脚步儿乱了。

二阿哥出门三天了呀， 一天赶一天远呀————了！

他声音的高亢是一种被压抑的高亢，沉闷的高亢，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烈挤压出来的爆发似的高亢。

在“哟噢”、“呀”、“了”这样的尾音上，又急转直下，带着呻吟似的沉痛，逐渐地消失在这无边无涯的荒凉的田野上。

整个旋律富有变化，极有活力，在尾音上还颤动不已，以致在尾音逐渐消失以后，使我觉得那最后一丝歌声尚飘浮在这苍茫大地的什么地方，蜿蜒在带着毛茸茸的茬口的稻根之间；曲调是优美的。

我听过不少著名歌唱家灌制的唱片，卡鲁索和夏里亚宾的已不可求了，但吉里和保尔·罗伯逊则是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常听的。

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

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它的

<<绿化树>>

朴拙，它的苍凉，它的遒劲。

这种内在的精神是不可学习到的，是训练不出来的。

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怦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

我十分震惊！

只听见他又用那独特的嗓音唱道： 哎———— 扑灯的蛾儿上天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蛤蟆蟆入了个地了， 前半夜想你没睡着呀！

后半夜想你个亮呀——了！

他把“了”唱成“留”音，把“没”唱成“姆”音，只有这种纯粹在高原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地方语音，才能无遗地表现这片高原土地的情趣。

曲调、旋律、方音，和这片土地浑然无间，融为一体。

听那波利民歌，脑海中会出现蓝色的海洋，听夏威夷民歌，眼前会出现迎风的棕榈，但那只是歌声引起的联想和激发的憧憬。

此刻，身临此境，我感觉到的是，这田、这地、这风、这被风吹来的云、这天空、这空中的山

鹰……即刻被这歌声抚摩得欢快起来，生动起来，展现出那么一种特殊的迷人的魅力……

在我眼前，这片土地蓦然变得异常妩媚了，使我的心不由得整个融进了这绝妙的情景里。

重要的不是他的歌声，而是他的歌声唤起了这苍茫而美丽的土地的精灵，唤醒了在我胸中沉睡了多年的诗情。

啊，今天，我已成了自由人，我要用我干裂的、没有血色的嘴唇一千遍地吻这片土地！

我屏声静息，听他继续往下唱： 哎———— 大马儿走了个口外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马驹儿打了个场了。

家中的闲事不管了呀， 一心儿想着个你呀——了！

忧伤是歌曲的灵魂。

他那歌声中的忧伤，浓烈的忧伤，沉重的忧伤，热情的忧伤，紧紧攫住了我的心。

这里，歌词不是主要的，我只是凭着曲调，凭着旋律才模糊地揣摩到歌词的意义。

他那对某个人或并不是对具体人而是对某种想象的思念，引起我被饥饿折磨殆尽的情思抬了头，也试着要思念些什么……这时，我才感到一阵辛酸：人的辛酸，而不是饿兽的辛酸……

“嘹嘹”的山鹰不知疲倦地跟随着我们，冬天的太阳有点偏西了。

可是，他的音调陡地一变，变得明朗而热情起来，尽管这种明朗和热情还覆盖有忧伤的阴影：

哎———— 黑猫儿卧到锅台上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尾巴儿搭到个碗上了。

阿哥的怀里妹躺上呀！

你把翘嘴嘴贴到脸上呀——了！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这是首情歌。

开始，我只是被他的歌声和旋律所震动，久废不用的想象力像一只停在枯树上的受伤的鸟儿被炸雷猛然惊起，懵头懵脑地奋力扇动着翅膀，飞到尽其可能飞到的地方。

在震动过后，回首一望，才看到被闪电照亮的枯树下，绿草儿正在发芽。

民歌的歌词，把我心灵里被劳改队的尘埃埋住的那最底一层拂拭了开来。

因为歌词毫不掩饰，毫无文采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情欲。

我回味地唱“阿哥的肉呀”那句热烈得颤抖的歌声，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情歌有如此大胆、豪放、雄奇、剽悍不羁。

什么“我的太阳”、“我的夜莺”、“我的小鸽子”、“我的玫瑰花”……统统都显得极为软弱，极为苍白，毫无男子气概。

于是，我二十五岁的青春血液，虽然因为营养不足而变得非常稀薄，这时也在我的血管中激荡进溅。

它往上冲到我的头部，使我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不成形的幻影，又使我浑身不可抑制地燥热起来……我的眼眶中不知什么时候溢出了泪水。

<<绿化树>>

啊！

这是我自由了的第一天。

五 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

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

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

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晖取暖。

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

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

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

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火，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火还是柴火，没有一个人。

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

都死绝了！

“……往哪坨儿拉呀……”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漫骂了一通。

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

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

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

我们也不搭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

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

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喝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

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

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

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

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

“喂，伙计们！

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

“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

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

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队。

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

还不如劳改队！

<<绿化树>>

劳改队还有火炕。

“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

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

“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

“过去的辘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

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

“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

“算了，大家少说两句。”

“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

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 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

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

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

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

“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

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

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猻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

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

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捡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

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

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做是残生。

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

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捡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

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

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

收工了。

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

“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

随即转身又走了。

“喂，队长呢？”

“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

“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

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

<<绿化树>>

“队长歇歇就来。

“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

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

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

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

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摞：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

你们干啥？

你们干啥？

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

“……”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

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

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

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

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

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

你活，也要让我活。

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

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

“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

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

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

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

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

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

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

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

六 我们刚把自己的铺位铺好，干草的烟尘还在土房里飞扬的时候，那个瘸子又来了，他说队长叫他领我们吃饭去。

好极了！

吃饭！

村子里有了活气。

冬天的夕阳在西南方向放射着金色的光辉，黄色的土墙上和七拼八凑的玻璃窗上，都映得光灿灿的。

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一个个冒出袅娜的轻烟，村子里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蒿草的香气。

这种与劳改农场迥然不同的、如风俗小说里描写的村居情景，使我莫名地兴奋起来：贫穷也罢，困苦也罢，我毕竟又回到了正常的环境中！

<<绿化树>>

伙房很小，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在伙房搭伙。

这使我有点担心：搭伙的人越少，每个人被炊事员剥削的量就越大。

不过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是工人了，我们可以进入伙房里面去打饭了。

在瘸子——现在我知道他是队上的保管员兼管理员——向炊事员嘀嘀咕咕地交代给我们按多少定量打饭的时候，我的近视眼迅速地在伙房里睃巡了一遍：扔在案板上的笼屉布，沾着许多馍馍渣！

其实，像“营业部主任”这类人真蠢。

他们不断地用最哀切的言词向家中勒索，搞得家里人惶恐不宁，扎紧裤腰带来支援他们。

我呢，既然不忍心盘剥老母亲，就要发挥自己的智能。

而我凭智能在目前的生活圈子里搞到的吃食，并不比从外面给他们寄来的邮包少。

每人四两：一个稗子面馍馍，再加一碗已经冷却的咸菜汤。

我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

我笑着对炊事员说：“我不要稗子面馍馍，你让我刮那笼屉布吧。”

“行，”炊事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把饭铲，“你要刮你就刮吧。”

我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足足刮了一罐头筒馍馍渣。

按分量说，至少有一斤！

“祖宗有灵！”

“虽然有股蒸锅水味，还是很好吃！”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

自由真好！

吃完了饭，队长给我们提着一盏马灯来了。

“大家都来啦？”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他在身上摸索着火柴。”

我马上走过去，帮他提着马灯，点上火，然后接过马灯挂在我的头顶上——这盏马灯有一半归我用了！

没有外援的劳改生活锻炼出了我的机灵，依靠外援活下来的“营业部主任”之流只能靠他们的后盾。

“队长，咱们就这么随便睡哇？”

“躺在门口的‘营业部主任’想改变现状。”

“随便睡，随便睡，睡哪儿都行”队长一屁股坐下来，在他的草铺上盘起腿，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队长，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

“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尉不满地说，‘这房子连炕也没有。’”

“凑合住吧，家嘛，在人收拾。”

队长有点不悦了。

他是个干瘦的中年汉子，自我介绍说姓谢。

在马灯昏黄的灯光下只看见他一脸胡茬，神色疲惫，穿一件补满补丁的棉干部服。

他说：“想睡炕，就得脱炕面子。”

这大冬天的，脱下的炕面子也不结实。

等开春再说吧。

“这就是说，我们要到春天才能睡上炕。”

而到春天，没有炕睡也行了。

几个人向谢队长打听怎么往这儿写信？

场部在哪里？

人保科什么时候办公？

<<绿化树>>

迁移户口的事应该找谁？

谢队长很快就知道了这几个人是不准备在这里干长的。

他把目光向我转来。

我坐在马灯底座下面的阴影里。

他眯缝着眼睛问：“喂，小犂子，你叫啥名字？”

“章永磷。”

“我欠了欠身子，干草在我屁股下窸窣作响。”

他把手中的一张纸就着灯光吃力地看了看。

“你家在北京哪？”

才二十五岁？”

“在北京。”

是的，刚满二十五岁。”

“你们几个就你年轻。”

咋？”

你也要回吗？”

“我不回。”

“好，不回就在这地儿好好干。”

谢队长高兴了，脸朝着我和蔼地说：“这地儿也不坏，总比你们原来呆的地方强。”

供应嘛，一个月二十五斤粮，还有两包烟。

工资嘛，一级十八块，二级二十一块……你们先拿十八块，干了半年，根据你们的劳力再说

话……”“是，是……”我表示很满足地点着头。

其他人靠在铺盖上冷冷地听着。

呆滞的灯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像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具。

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比劳改农场强的只是有工资。

而十八块钱在这困难时期买不到十斤黄萝卜，况且这里还不发衣裳。

粮食定量和劳改农场一样，七扣八扣，真正吃到嘴的至多二十斤（一月二十五斤定量在正常条件下也差不多够了，但在没有一点副食、油脂、菜蔬并且每天都要干体力活儿的情况下，你吃一个月试试！

而我长年累月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定量还要低，每月只有十五斤）。

我满足的不过是，他在说话时有意避开了“劳改队”三个字而已。

谢队长又从几个口袋里东掏西摸地拿出一堆香烟，发给每个人两包，向每人收了一角六分钱：“双鱼牌”，八分钱一包。

太好了！

这是真正的香烟，不是葵花叶子、白菜叶子、茄子叶子……这类代用品。

香烟，对我来说几乎和粮食同等重要。

但我看到不吸烟的“营业部主任”也有一份，又不禁妒火中烧。

他会在你烟瘾大发时，用两毛钱一根的高价“让”给你。

平均主义的原则毕竟有弊病！

“每天九点开饭，十点出工。”

下午四点收工。

大冬天的，也没啥营生干。

你们明天就出工吧，等到休息天再休息……”谢队长站起来，拍拍屁股要走。

他不说星期天，却说“休息天”，但不知哪天算“休息天”。

“队长，没有炕，砌个炉子行不行？”

这屋子，晚上要冻死人。

“中尉围在被窝里，又提出特殊要求。”

<<绿化树>>

这个集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

“炉子是要砌的。

那有几块土坯就行。

可公家只有烟煤，没有干炭。

“谢队长袖着手，他也觉得冷，”还有窗子，也要糊一下，明天早上你们去办公室领点旧报纸，再到伙房打点糗子。

“烧烟煤的炉子我会砌。

我自告奋勇地说。

我有两个稗子面馍馍的贮存，还是愿意干重活的。

“哦？”

那跟烧干炭的炉子可不一样哩。

“谢队长用感到意外的眼光看了看我，”这样吧，明天你就留在家里，把炉子砌了，窗子糊了……哦，对了，你们还得有个组长。

我看，就章永璘当上吧。

“很好！”

我自由的的第一天就当上了组长。

七 晚上，我万分小心地钻进棉花网套里，就像把一件珍贵器皿放进衬着缎垫的锦匣中一样。

因为我既要当心脚趾头伸进破洞里去，或是勾断了线，把破洞越撕越大，又不能把被筒敞得太开，不然脊背就直接贴在稻草上挨扎了。

随后，从盖在网套上的棉衣里掏出早上得到的两个稗子面馍馍，在被筒里嗅一嗅，玩味玩味，用洗脸的毛巾包好，埋在墙根下的稻草里面。

夜，寂静得使人以为世界已经离开了自己。

而在劳改农场里，半夜都有值班人员的脚步声。

于是，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

那被痛苦的、我不理解的现实所粉碎了的精神碎片，这时都聚集拢来，用如碎玻璃似的锋利的碴子碾磨着我。

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要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道林·格雷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

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我不认为人的堕落全在于客观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精神力量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这个世界就纯粹是物质与力的世界，人也就降低到了禽兽的水平。

宗教史上的圣徒可以为了神而献身，唯物主义的诗人把崇高的理想当做自己的神。

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

而活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仅仅是为了活？

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现在我是一切为了活，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句：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的牺牲的时候，诗人尽在琐事上盘算，想着世俗的无谓的烦忧；他的神圣的竖琴暗哑了，他的灵魂沉浸于寒冷的梦；在游戏世界的顽童中间，也许他比谁过得都空洞。

我何止于“空洞”，简直是腐烂！

但怎么办？

“牺牲”，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绿化树>>

过去朦胧的理想，在它还没有成形时就被批判得破灭了。

尽管我也怀疑为什么把能促使人精神高尚起来的东西、把不平凡的抒情力量都否定掉，但我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否定比一切批判都有力！

那么，新的理想、新的生活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据说，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但是说“牺牲就是为了改造自己”，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那等于说我不死便不能改造好，改造自己也就失去了意义。

今天，我已成了自由人，如果说接受惩罚是为了赎罪，那么，惩罚结束了就可说是赎清了“右派”的罪行；如果说释放标志着改造告一段落，那么，对我的改造也就进行得差不多了吧。

今后怎么样生活呢？

这是不能不考虑的。

但是，这个农场并不能使我感到乐观，并不能把我的文化知识发挥出来，以检验我改造的程度。

我虽然自由了，但我觉得我并没有落在某一处实地上，相反，更像是悬浮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我脸朝着墙壁。

墙角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和老鼠洞的气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温暖的干草味。

旁边，老会计在坚韧不拔地磨牙，那不把牙齿咬碎不罢休的咯咯声，仿佛象征着我们艰辛的未来。

棉絮冷似铁，我浑身没有一点热气。

“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感叹又油然而生。

我经常发这样的感叹。

这成了揣摩不透的谜。

有时，我觉得劳改之前不过是场大梦，有时，我又觉得现在是场噩梦，第二天醒来我照旧会到课堂上给学员们讲唐诗宋词，或是在我的书桌前读心爱的莎士比亚。

但是肚皮给了我唯物主义的教育。

你不正视现实吗？

那就让你挨挨饿吧？

我目前的境遇是铁的现实！

那么，这是宿命吗？

但普遍性的饥饿正使千千万万人共享着同样的命运。

我耳边又响起了哲学讲师的声音：“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

“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

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稠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

开……棉花网套被我微弱的体温慢慢焐暖了。

我感到暖烘烘的、软绵绵的，感到了我的存在。

存在是什么？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活着多么好，能够思想多么好！

好得我都不想睡觉……但我还是睡着了。

八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就令我极为懊丧，乐极果然生悲——两个稗子面馍馍都被老鼠吃光了！

是老鼠吃的，不是人偷走的，洗脸毛巾也被咬破了。

我悄悄地团起烂得像渔网似的毛巾，塞进裤子口袋里。

我还不能声张，“营业部主任”知道了，又会幸灾乐祸地嘲笑我。

九点钟才开饭，我靠在叠起来的棉花网套上，几乎要晕过去。

如果这两个稗子面馍馍不丢，即使我不吃它也不觉着什么。

而这巨大的损失加深了我的恐惧心理，竟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饿。

<<绿化树>>

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撞；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

要吃！

要吃！

我没有力气动弹，更没有心思思想，只一个劲儿地转念头：必须把损失加倍地捞回来！

这时，昨夜里那些聚集拢来的精神碎片又四面进散了，我又成了生活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活着的狼孩！

从伙房打回饭，都坐在各自的草铺上默默地吃着。

罐头筒的优势失去了。

这儿的炊事员似乎没有视觉误差，他绝对相信自己手中的勺子，没有给我多加一点。

但是没关系，我已经把门路想好了。

吃完饭，按照谢队长的安排，由一个面目阴沉的农工领着其他几个人随大队出工。

那个瘸子保管员腋下夹着一卷旧报纸又来了。

他放下报纸，告诉我土坯在什么地方，砖在什么地方，小车在什么地方，又领我到库房里去拿了把铁锹，一个小水桶，一把瓦刀，几根做炉算的铁条。

临走时说，糗子到伙房去打，他已经跟炊事员说好了。

另外还需要什么，可以到办公室去找他。

砌炉子，至少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大工，一个小工。

但我宁可不要小工。

土坯和砖都近得很，就堆在我们的房头上。

土嘛，院子里随便挖一点就行，这儿是碱土，不冻的。

至于水，还是少用为好，不然光烤干炉子就要用很长时间。

瘸子一走，我拿起一张报纸首先跑到伙房去。

“师傅，我打糗子来了。”

我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仿佛我经常吃得很饱似的。

“你自己去舀吧。”

他坐在门口晒太阳，他是真正地吃饱了，“你可别舀得太多。”

“你看，”我把报纸一扬，“包一包就行。”

案板上放着半脸盆灰白色的稗子面，看来是事先给我准备的。

我摊开报纸，把所有的稗子面都倒光，摁得实实的，捧了回来。

什么“打糗子”，吃得饱饱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稗子面是没有黏性的。

即使借着潮湿糊上报纸，水分一干就会掉下来。

我先不糊窗子，现在最急需的是火。

我在劳改农场跟中国第一流的供暖工程师干了一个月活，专给干部砌炉子——他也是“右派”，他当大工，我当小工。

他曾教给我一个最简便的砌烟灶的方法；他还说，只要给他一把铁锹，其余什么也不用，他在坡地上就能挖出一个火又旺柴又省的炉灶：学问不过在进风口、深度和烟道上。

我一会儿上房，一会儿挖土，干得满头冒汗，不到两小时，我就把一个最原始而又最合乎科学的取暖炉砌好了。

我一分钟也不歇息，拉上小车去伙房门口装了半车烟煤——一车我拉不动。

沿途又顺手在不知谁家的柴禾堆上抽了几根干柴。

我用颤抖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炉膛里的柴火。

火苗和烟都朝着烟道蹿过去。

一会儿，烟没有了，淡红色的火苗在烟道里呼呼地叫。

又一会儿，火焰旺得像火山口喷出的岩浆，在炉膛里形成一个扇面，争先恐后地往狭窄的烟道口跑。

这时候，我加上一铁锹煤，炉子里像施了魔法一般，腾起一股黑烟，但即刻被烟道吸了进去。

火焰仍顽强地从煤的缝隙中往外冒。

<<绿化树>>

不到五分钟，火焰的颜色逐渐加深，由淡红变为深红，然后变成带青色的火红，这就是真正的煤火的颜色了。

下一步，就是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在房子里干什么。

我找到办公室，瘸子恰好在那里像泥人儿似的呆坐着。

我无暇顾及有人干得满头是汗而有人却什么都不干这种现象是多么可笑，问他要了一把小钉子、几片破纸盒上的纸板、一把剪刀——只要不领吃的东西，他都会慷慨地给我，旋即急匆匆地跑回来。

我把硬纸板剪成一条条长条，压住铺在窗户上的报纸，用钉子在窗棂上钉得牢牢的。

像个宿舍样了。

按谢队长的说法，这就是“家”！

我干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

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烟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

我先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锹头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一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倒一撮在滚烫的铁锹上。

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稗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着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的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趁稗子面糊在铁锹上煎着的空隙，我还把我草铺下的老鼠洞堵了起来。

这里有老鼠，没有料到！

劳改农场是没有老鼠的——那里没有什么东西给它吃，它自己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险。

土房里暖和了起来。

我肚子里暖和了起来。

我身上也暖和了起来。

我坐在炉子旁边昏昏欲睡了。

但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我从棉花网套里掏出“双鱼牌”香烟，抽出一根，转圈捏了一遍——还好，没有烟梗子——捡起铁条上掉下的煤渣把它点燃。

我不让一丝烟从我的口腔和鼻孔漏出去，屏住气息，全部吞进肚子里。

一霎间，一种特别舒服的陶醉感立即传遍了我的全身。

可是，不知怎么，我心中却蹿出了一阵扎心扎肺的酸楚……不能多想！

我知道我肚子一胀，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

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

我小心地掐灭香烟，把烟蒂仍装进烟盒里。

我要找点事情来干。

收拾好工具后，我把剩下的稗子面包上几层报纸，在墙上挂起来。

把炉子加足了煤，拿起我补了又补的无指手套，拍拍身上的土，走出了我们的“家”。

九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

高原上的黄土到处泛着柠檬色的辉光。

村子四周没有什么树，几株脱了叶的白杨，如银雕一般傲然耸入暖洋洋的天空，把它们瘦伶伶的影子甩在脚下。

太阳偏西了。

昨天这个时候，正是车把式海喜喜引吭高歌的时候。

现在，我肚子胀了，回味那忧伤而开阔的歌声，竟使我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中的几个段落。

我经常有些奇异的联想，既毫不着边际，但又有某种模糊的、近乎神秘的内在联系。

当然，只有在肚子胀了的情况下，脑海中才会产生种种联想。

<<绿化树>>

这时，我就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歌旋律，似乎给我注入了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

那歌声、那山鹰、那广阔无垠的苍凉的田野、那静静的连绵不绝的群山、那山的绵延就是有形的旋律……整个地在我的心中翻腾。

一时，我觉得我非常美而强壮了。

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向马号方向走去。

我想看看马。

我很喜欢马。

它们总使我联想到英雄的事业：去开拓疆土！

去开拓疆土！

……可是，马号前面却有一群农工在那里翻肥。

我的组员——“营业部主任”、中尉、老会计和报社编辑几个人也在其中。

我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家收拾好啦？”

“谢队长手拿铁锹，站在高高的肥堆上，一眼就看见了我。

在白天看来，他比昨天矮小得多。

“收拾好了。”

“你来干啥？”

“我……我总不能说我来看看马。”

马有什么可看的？

种种异想都从我脑子里飞逃了出去，只剩下一个意识：我是一个农工！

我只好说：“我来干活。”

“好。”

“谢队长高兴地咧开满布胡茬的嘴，‘你刨粪吧，刨下来她们砸。’

“他给我指定一个地点。”

原来这里还有妇女。

我从来没有跟妇女一起劳动过。

四年劳改农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看见过妇女。

我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走到她们中间，不知道干什么好。

“你拿镐头刨吧，你刨一块咱们砸一块。”

“一个妇女对我说，‘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的，刨不动大块就刨小块的。’

“她的音色柔软，把本来发音很硬的方音也变得很圆润，尤其是语气中的关切之情使我特别感动。

我很长时间没听过“别累着”这样的话了；我耳边响着的一直是“快！快！”

“别磨洋工！”

“这类的训斥。”

但我没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

我兴奋地想，我要好好替她刨，刨下来后还要替她砸碎。

我用眼睛在肥堆旁扫了一遍：这里没有镐。

我忘乎所以地向谢队长喊道：“队长，没有工具呀！”

“你干球啥来的？”

！

“出乎我意外地招来一顿训斥，‘你吃席来还得带双筷子哩！’

“旁边的几个妇女没有恶意地嘻嘻笑了。”

我脸涨得血红。

我又羞愧，又痛恨这个谢队长：这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

<<绿化树>>

正在我手足无措的当儿，那个妇女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给！你到我家去拿。

就在门背后，有个好使的镐头。

“我窘迫地接过来，嘴里嘟嘟囔囔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喏，就在西边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

“她告诉我，“好找得很，一拐弯，头一间就是嘛。

“就是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呀！

“另一个妇女哧哧地笑道。

“你这婊子，你门口才挂招牌哩！

“给我钥匙的妇女并不气恼，对她笑骂着。

我转身走了，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对骂。

这是把自制的黄铜钥匙，磨得很光滑，还留有人体的微温，大概是她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抚摩着它，仿佛它是她的手。

门口并没有挂什么“美国饭店”的招牌，和别人家一样，堆着一堆发黑的柴火，拉着一根晾衣裳的绳子。

我开开门。

这是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土坯房，一铺火炕就占了半间。

泥地扫得很干净。

我从来不知道泥地经过加工，会变得像水泥地面一样的平整。

屋里没有什么木制家具，台子、凳子都是土坯砌的。

靠墙的台子还用炕面子搭了两层，砌成橱柜的式样，上层拉着一块旧花布做帘子。

所有的土坯“家具”都有棱有角，清扫得很光洁。

土台上对称地陈列着锃亮的空酒瓶和空罐头盒作为摆设。

炕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毡子，一床有补丁的棉被和几件衣裳——还有娃娃的小衣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

炕围子花花绿绿的，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是整整一本《大众电影》，还有《脖子上的安娜》的彩色剧照。

炕下面有个锅台，锅圈上坐着一个盖着木盖的铁锅！

我头一次只身一人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情，但又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冲动：想揭开锅盖，掀起帘子，看看有什么吃的——凡是贮藏食物的地方对我都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罪孽！

我赶快把门背后的十字镐扛了出来，回到马号那里去。

“门锁上了么？”

“我低着头还给她钥匙，她问我。

“锁上了。

“我开始抡镐。

有一个妇女在旁边哼哼唧唧地唱起来： 尕妹妹的个大门——就浪三趟地， 不见我的尕妹子好呀模样呀！

“我把你这个——”她转过身去，用最粗俗的话骂了那妇女一句。由于这话非常形象生动，几个妇女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

我不明白那妇女的歌怎么触犯了她们，惊愕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

她正和那妇女对骂，后背朝着我。

我只看见系在一起的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花布棉袄上。

棉袄的背部和两肘用颜色稍深的花布补着几块补丁。

马粪尿掺上土，就是所谓的厩肥。

冬天里冻得实实的。

<<绿化树>>

我们要把厩肥刨下来，砸碎冻块，翻捣一遍，再由马车运到田里卸下，一堆一堆地纵横成行，铲一层浮土盖上，等到开春撒开。

我因吃了很多稗子面煎饼，又想帮她多干点，所以很卖力，一会儿就刨了很大一堆。

”

<<绿化树>>

编辑推荐

马缨花让世界上所有女人的靓丽、娇媚，都失去了光彩。
张贤亮：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生命力最顽强的作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